

“教授治校”制度与 西南联大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

◎ 江 渝

【摘 要】 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制度是教授集体管理学校行政与学术事务，大学的管理权、决定权主要在教授。这一制度产生的基础是学术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在以教授为重，以学术独立、自由为本位的理念指导下，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促成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平等自由的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模式与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是西南联大成就卓著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教授治校；西南联大；校园民主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0)03-0000-76

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承继了三校“思想自由”的传统，并加以扩展和升华，形成了以学术自由为本位的校园民主文化。这种文化是通过教授治校制度得以实现和保障的。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学术自由的基本价值观。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尊重学术的地位与权利，使教授成为大学管理的决策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师生之间平等、自由的校园民主文化。

一、教授治校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学术自由的基本价值观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明确地指出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是“思想自由”。之后，“思想自由”原则逐渐被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所接受，不仅是在北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在其后的许多大学。抗战前，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办学理念之中，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思想自由原则。当然对学者而言，“自由”主要的还是落实在学术自由上。学术自由是大学独有

〔作者简介〕江渝，四川教育学院历史旅游系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00。

的价值观,它应包含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发表其研究成果的自由、参与学术团体活动的自由、进行学术交流的自由及大学生学习的自由。

抗战期间建立的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和合并体制的条件下,三校固有的产生在思想自由传统下的民主氛围,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和谐共生,发扬光大。

在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大力倡导和全体师生的努力践行下,学术独立、自由已不仅仅是联大学人的个人权利,而外化成了一种精神,被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其表现是: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想、忘我的境界、求实的作风。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在1941年一篇名为《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中写到:“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1]

文学院教授冯友兰也曾写过一篇名为《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十分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在学术独立精神的指引下,“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视学术创造为安身立命的重要方式,忧患世事的人间情怀,自由洒脱、达观智性的文化气质”,在言谈举止之间一个个都体现出不拘小节、特立独行的人格^[2]。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这些人保持和延续的。用冯友兰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句话来概括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意识”是十分贴切的。“在联大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是教育的主要方法,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3]学术交流,派无疆封,教师门户开放,学生学习自由,于是联大内不同院系,不论师生,争鸣有加而和气无减。联大人共同营造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生态环境,以及“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

和且平”的堪称完美的学术图景^[4]。

制度文化是构成大学校园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基本价值观成为了民主管理的良好基础,它需要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从大学文化来看,通过教育目的、课程的途径来实现的文化,是一种“软文化”,主要以观念形态来体现;而通过制度确立来实现的文化则是“硬文化”,主要是以大学文化的内在机制,维系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转来体现。通过制度确立与实施更能直接体现大学文化主体的文化意图。

二、教授治校制度是实现学术自由基本价值观的有力保障

西南联大整个教育管理制度及其主要思想是教授治校,它充分体现了学术独立、自由的文化意图,同时也是学术自由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在管理上的有力保障。

教授治校源自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抗战前,北大、清华、南开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教授治校的模式;西南联大成立后,继承了三校的传统,经过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西南联大特色的,以常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三会为核心的教授治校制度。

依照三校联合组建的规定,联大由三校的校长组成校常委会,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每人任期为两年。但事实上,主要由梅贻琦主持校务工作,遇到重大事情,他总是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倚重学校各级机构共同协助解决,让教授们一起来管理学校。

梅贻琦从来就把教授的重要性摆在办学的首位,除了提出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5]他还认为,“凡一校精神所在”,“实在教授之得人。”校长固然重要,但与教授相比,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还是教授。西南联大固然因三校合并而人才济济,对于校外的名家大师,他还总是设法延聘招纳。

梅贻琦在工作中,严格按民主程序进行决策,他既是常委会主持人,又是校务会议主持人、教授

委员会主席,在这样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中,该校务委员会定的事,常委会决不包办,该常委会定的事,决不个人说了算。在一些学校的重大事务上,他十分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让教授们能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作用,“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6]沉默寡言的他,常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吾从众”。

在常委会领导之下,具体办事机构有“两会三处”。“两会”是校一级的民主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由常委会主席召集工作,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行政处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主要负责讨论审议学校的重大事项及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也由常委会召集工作。通常是在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学校的工作后,讨论学校教学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从职能上看,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依照常务委员会决议处理校务,而教授会议只是一个咨议机关。常务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三个会议,使会议的议论和决议有利于常务委员会意图的贯彻。但在实际运作中,教授会的意见对学校大政方针政策往往有着重大的影响与作用,常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有时需拿到教授会通过,教授会做出的决定常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也应予以认可。在学校遇到对内或对外重大事件的时候,教授会所显示出的权威作用,甚至大于校务会。如“一二·一”运动能够在全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并迫使国民政府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联大教授会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三处”为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在西南联大,除了三位常委为专职外,三处及各院院长、系主任均由教授兼职,这些教授除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积极参加具体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

为了组织校部决策的实施和加强对教学、行政管理的指导,学校还设置了各种专门委员会。有的属于常设性质,如教师聘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教授兼职担任,根据教学的需要,由学院提出职位和人选,聘任委员会讨论决定。有的属于临时性

质,经常委会讨论决定,聘请一些教授组成,指定负责召集人,办理某项事情。事情办完,机构也随之撤销。这些专门委员会约有70多个。其成员都是由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聘请教授组成。

教授治校通过上述机构设置和赋予教授参与管理的多种权限而得到实现。西南联大自上而下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对于来自政府部门干涉了学术自由的命令,教授们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公开抗议,他们是学术自由基本价值观的忠实维护者和严格的监督者。进一步营造出了以学术自由为本位的校园民主文化。

在教授治校制度之下,学生作为大学文化的主体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学生自治应运而生。除了训导处外,联大没有设置其他专门管理学生的机构,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自律来进行管理。学校对学生会的活动只是加以指导,一般不硬性干预。学生会的选举、负责人的产生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均由学生自行组织。

联大学生也同教师一样,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首先表现为学习的自由,即转系、选习课程、选择教师的自由和怎样学习的自由。学生只要符合转系的条件,转系是非常自由的,而且是可以文理科互转。其次是表现在建立社团的自由,在课余,联大学生组织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学生社团。这是学生自律的有效形式。无论左中右的社团,学校一视同仁,从不作过多限制。西南联大学生社团先后有六、七十个之多。很多有名望的教授都被学生聘为社团的指导教师。在西南联大,社团和校园文学是师生共同活动的舞台。在与教师的交往中,学生会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带入,甚至会出现“文化反哺”现象,与教师相互交叉、融汇,共同组成异彩纷呈的校园文化图景。再次是联大实行的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赋予了学生更大的学习自由。学生可以任意选课,既可以选本系的,也可以跨系、跨院选修,甚至不选课而去旁听。

对西南联大为学生创造出的自由、宽松的环境,联大学生赵宝煦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对于同学,学校领导似乎放手让学生自由发展、自由竞

争。如果把学校比作个大花园,那么,除去自然供应的阳光、雨露之外,作为园丁的校领导,则只管培土、施肥。……学生进了学校,完全自由发展。学校并不企图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铸造学生。有人苦读书,有人忙于社团活动,甚至有人在学校注册后,就跑滇缅路,在仰光和昆明之间跑单帮做买卖。”^[7]

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之所以被称为是一种民主管理模式,是因为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师、学生三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在这三个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结构和机制,管理层对教师负责,教师对学生负责,学生对学校负责,并在学术自由这条主线下相互作用。学校的建设、招生、教学、科研、教师聘任、经费使用等事项,都按教授的意志做出决定,使学术权力始终处于学校的核心地位,成为学校的凝集力量,很自然把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贯穿到管理行为中,营造出以学术自由为本位的校园民主文化。

三、以学术自由为本位的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

西南联大注重培育以大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群体意识。西南联大在对自由、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中,在三校原有传统的基础之上,通过教授治校制度的全面贯彻,达到了一种内在的融汇与升华,逐渐形成了以“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为核心价值的联大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学术至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平等自由的校园民主文化。

西南联大学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丰硕的学术成果,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博采众长,以此提升治学境界是其“法宝”。它表现为:其一,教师之间尊重彼此的学术观点。如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庸与闻一多都对《楚辞》有较深入的研究,但观点大相径庭,各有卓见。两位教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讲演,都讲《楚辞》中的《九歌》,但相安无事。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由雷海宗、吴晗、钱穆同时开讲,政治、学术观点不同,讲法自然有别。三位教授在课堂中各持己见,自由发挥,但不会相互诋毁,水火不容。其二,教师之间因所持的学术立场的不同

而展开的学术辩论,也以心平气和的方式进行,不存门户之见。如冯友兰和洪谦在联大关于形而上学的辩论,文学院关于学院能否培养文学家的讨论,费孝通与陶云逵关于社会学理论的作用的辩论等等。费孝通曾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云逵和我两人师身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个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引申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8]

其三,联大教授之间除了就大家共同关心的论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外,在发表著作和文章之前,也喜欢拿去给相关专业的教师征求意见,特别希望能听到另外的声音,这种征求意见及其回应往往又成为学术上的争论。其四,教授之间相互听课成为风气。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教授讲魏晋玄学时,冯友兰“每堂不缺地去听”。沈有鼎是哲学系的教授,却去听中文系闻一多教授所讲的《周易》,唐兰教授所讲的《说文解字》,外文系冯至教授所讲的《歌德》。从冯至残缺不全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仅在1942年6月到11月,冯至“就听了陈康的‘柏拉图的年龄论’、冯文潜的‘美与丑’和朱自清的‘宋诗的思想’等”课程^[9]。有的教授还到中文系去听似乎与自己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文解字》课程。“一位是哲学系的沈有鼎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他们两位每堂必到,整整听了一学期。”^[10]

在教授治校制度之下,教师能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学生能焕发出很高的学习热情,使教与学形成了良性互动。教师们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教学,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教学的内容,使学生能够领略到科学与文化的最新进展。如西南联大规定,一年级的基础课必须由最有学术造诣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担任,这为引导学生过好大学的学习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表现在教师们注重论文指导、实习课、社会调查等教学环节的教学,并强调学生要掌握学习方法,让学生了解进行科学研究的途径。不少当时联大的学生在回忆录中都谈到,联大的教师对他们毫不保留,他们在联大学到了老师的治学方法,产生了

深入学习的愿望。正因为西南联大教师对学生非常负责,学生也感到需要教师,这就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生可以随时向教师请教,甚至敢于指出教师讲授内容的疏漏之处。当时学生到教师家里讨论问题或是求教,非常的随便。如文学的学生经常会到闻一多教授、燕卜逊教授家中谈天、喝茶、喝酒;学哲学的学生经常到冯文潜教授家中讨论问题。

更为经常而广泛的师生之间交流是“学术聊天”。几乎在每一个学术、人格上具有一定魅力的教授身边,都有一大批学生在追随。师生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聚谈、切磋、研讨,使蛰居的斗室、嘈杂的茶馆、怡人的林泉,都成为了另外一个课堂。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的心态尤为放松,才思敏捷,灵感不断,往往是咳玉唾珠。学生往往能在似乎是无边无际的闲聊中获得学术上的滋养。

这种情形就像梅贻琦在他发表的著名文章《大学一解》^[11]中提到“从游”关系一样:“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他还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而且要为学生“自谋修养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树立楷模,通过身教,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使教育达到不言而喻的功效。

“从游”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能够对课堂教学构成一定的学术互补,在陶冶学生的治学精神上,更是功不可没。这主要表现在:联大教师忘我地投入学术研究的态度,在“从游”过程中对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教师对学生的指引以及师生之间的友谊,让不少学生们逐渐体会到书本中的无限乐趣,因此读书问学,蔚然成风。为数众多的学生以教师为榜样,立下了做学问的志向,潜心学问,埋头著述。

联大学人、著名女诗人郑敏回忆道:“在联大,几乎每个教授都同自己的学问融为一体,用毕生的智慧和学生对话。学术高于一切,远离名利,成为一种无限的精神升华,联大解放了人的智慧,给予学生极大的创造空间,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12]

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中西结合教育模式的探索一直在进行着,甚至有人将西方的现代大学体制与中国书院师生步履相随、随时质疑问难的精神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认为是最理想的大学模式,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创办的基本设想就是这样的。在西南联大,现代大学制度与书院精神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有机的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西南联大是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无论是教授治校制度、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选课制,还是西方式的院系设置与课程体系,现代大学的教育制度在西南联大都全部地实现了。另一方面,战时共赴国难的豪情与生死与共的经历更是密切了联大师生的关系。从长沙临大到昆明的三千里的长征、在日军空袭下的弦歌不辍、共同面对战时艰难生活时的相互扶持,这一切而打破了师生之间的心理墙垣,缩短了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

事隔半个多世纪,在联大学生所写的众多的回忆录中,对这种师生之间普遍存在的平等相处的关系仍记忆犹新。如著名作家汪曾祺认为“自由”二字是他对西南联大最鲜明的回忆,著名世界近代史专家刘祚昌说,置身于西南联大,最为触目的现象,就是自由散漫成风。冯友兰也曾说过,师生之间真正地打成一片,是以以前的三校所没有的。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南联大独特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他人的尊重,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学习,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发展。由于教师有教学自主权、学生有学习自主权、教学方法贯彻了学术自由精神,这形成了西南联大学术至上的学风。

后来成为国际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把他

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13〕}王浩说：“我在1939年秋到昆明作新生，一直住到1946年春离开准备出国，住了将近七年。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样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人和学业打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14〕}

在西南联大这样的一个醉心于吸取新知、热

情论学的大熔炉中，学生们皆学业有成。很多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起联大的生活时，无不感慨地认为联大是他们成才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各个学术领域里大放光彩。

四、结束语

在教授治校制度下，西南联大培育了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文化，它发扬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受业、传道、解惑”的传统，与书院的精神是那么的吻合，并突破了“师道尊严”的局限，发展出了自由、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存在于教师之间、也存在于师生之间，这是西方个人独立、互相尊重的民主精神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的第一次落脚。由于大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站，大学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引领大众前行的带头人，因此西南联大创造的大学校园民主文化，为中国历史的进步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它不仅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榜样，也为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贺麟.学术与政治〔A〕.杨东平.大学精神〔C〕.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42.
- 〔2〕 刘晓林.动荡困厄中的精神守望〔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 〔3〕 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A〕.汪曾祺全集(四)〔C〕.356.
- 〔4〕〔1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A〕.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283，22.
- 〔5〕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6〕 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83.
- 〔7〕〔9〕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A〕.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C〕.第32期，2002.125,58.
- 〔8〕 潘乃谷.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 〔10〕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精神的魅力〔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7.
- 〔12〕张同道.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J〕.中国社会科学，1994.(6).
- 〔13〕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A〕.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66.
- 〔14〕王浩.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事〔A〕.中国哲学(第十一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斌)